

盖尔坦·杜加是一名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机舱服务员。长期以来,他被认为是美国艾滋病毒的“零号病人”,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将艾滋病病毒传人美国的并非杜加。

一个国际科研团队进行了这项新研究,并于近日将研究成果刊登于《自然》杂志上。“没有人应该为艾滋病毒的传播而受到谴责,因为没有人知道谁才是那个真正的‘零号病人’。至于上世纪70年代艾滋病究竟是如何从加勒比海地区传入纽约的,目前也尚无定论。”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迈克尔·沃罗贝教授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说道,他是亚利桑那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系教授。

“‘零号病人’可能是任何人,甚至可能是血液制品。上世纪70年代美国曾经使用过事实上来自海地的血液制品。”沃罗贝说,“我们所做的,是尝试去了解我们已知的第一例艾滋病的起源。当我们追溯到那个时代,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模式。”

目前美国有120多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那么艾滋病是怎么从非洲途经加勒比海传播到北美的呢?一份前沿报告对20世纪70年代血液样本进行分析后,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从来就不存在的“零号病人”

1981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研究人员首次记录了一种非常神秘的疾病,他们在研究中将这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或称艾滋病病毒与性行为联系起来。以加利福尼亚为起点,研究人员开始对一群携带艾滋病病毒的男性同性恋进行调查,最终他们在10个美国城市找到了超过40个符合要求的病例。杜加就处在这个病患网络的中心。当

长期以来,这个男人一直备受指责,人们认为他将是艾滋病传入了美国。最近,科学家们却要为他“洗清罪名”。

■ 盖尔坦·杜加



◆ 化石君 译

时,研究人员将杜加标记为“0号病人”,意思是杜加居住在“加州之外”,并不是说他是美国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然而,科学文献上却将字母“0”误解为数字“0”,等到媒体和公众都注意到这个名字时,伤害已经造成。杜加及其家人多年来都被指责将艾滋病病毒传播到美国。记者蓝迪·席尔在采访杜加后出版了《世纪的哭泣》一书,书中称杜加具有反社会的行为,并因此有意把身上的艾滋病病毒传染给别人,至少也是不顾后果地危害其性伴侣。1987年,美国《国民评论》杂志将杜加称为“艾滋病版哥伦布”,《纽约邮报》则在头版上称他为“给美国带来艾滋病的男人”。

“我们对这些新闻感到很恼火,这只是一个误读造成的简单错误,但人们却一点也不消停,因为——‘给美国带来艾滋病的男人’——这个话题很诱人。如果这件事是真的,会很烦人,但因为它不是真的,就更令人心烦了。”詹姆斯·柯兰博士说道,他是埃默里大学罗林斯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也是该大学艾滋病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柯兰在1981年协助疾控中心艾滋病工作组的工作,之后领导艾滋病研究部门一直到1995年。他并没有参加这次的新研究。关于杜加,他解释道:“疾控中心从来没有说过杜加是‘零号病人’,更没有说过他是第一个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这个谣传除了对他本人的声誉造成潜在

的伤害,同样也对科学可信性造成损害。在美国,艾滋病由单一源头开始传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可能是最初有好几个人同时感染上了这种疾病。”柯兰认为“零号病人”的说法其实一直都是错的,并且漏洞明显,“但没有哪个科学家提到过这一点。”

1984年杜加死于加拿大魁北克市,死因是艾滋病并发的肾功能衰竭。如今,30多年后的今天,科学家用他的血样为他洗清了恶名。

基因研究的新贡献

在最新的研究中,沃罗贝和同事对1978—1979年间在纽约及旧金山收集的用于乙型肝炎研究的档案血样进行分析,这些样本都来自男性同性恋者。“我们对样本进行筛选,发现在这些早期样本中,乙型肝炎患者中呈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的几率非常高。”沃罗贝说道。

研究人员完成了8个样品的艾滋病病毒完整基因组测序,这些是北美地区最早的艾滋病病毒基因组。他们还同时修复了杜加血样中的病毒基因组。由于血清样品的RNA会随着时间而降解,沃罗贝等人研发出了一种新技术来修复这些遗传物质,即将患者血液中的基因组分解,然后提取出艾滋病病毒中的RNA来复原病毒遗传信息,这跟科学家们在重建尼安德特人古老基因组时采用的方法非常相似。

“这个重建方法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们能够从旧的血清样本中修复基因组全序列。这是一个很大

的贡献。”柯兰说道。

对基因组进行对比分析后,研究人员并没有发现任何生物学方面的证据,能证明杜加就是将艾滋病病毒带入美国的源头,他所携带的艾滋病病毒也并非特殊的病毒株,在病毒演化进展上比较靠后。

研究人员还发现了另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即艾滋病病毒当时早已在加勒比海地区传播开来,并在1970年前后传入了美国。

关于人类史上第一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病例,科学家普遍认为是在20世纪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艾滋病病毒从黑猩猩转移到了某个人身上,进而进入人类群体。另一个普遍共识是,之后艾滋病病毒越过了大西洋,迅速在加勒比海地区蔓延开来,然后来到了美国。

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在6月份发表了一份独立研究报告,称在过去50年间,通过特定的迁徙路线(主要是旅游或贸易),艾滋病病毒在世界各地传播。如今,新研究团队希望其研究成果可以使人更好地了解艾滋病病毒究竟是如何在人群中传播的,指责特定某一个人作为传染病的源头是非常不合理的。

“历史证据已经从许多方面证明,几十年来人们一直使用的‘零号病人’概念其实是谬误。”剑桥大学医学史学家理查德·麦凯说道,他也是新研究报告的合著者之一。“这个研究提供了多个角度,使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过去一段重要时期的复杂性。考虑到这种复杂性,如果我们在讨论早期阶段的传染病时将注意力放在‘零号病人’,就很有可能掩盖掉一些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而这些因素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比如贫穷、法律、文化不平等、医疗卫生和教育上的障碍等因素,这些重要的决定因素有被忽视的风险。”

摘自《看世界》2016年12月下

文学的生命——我和我的作家朋友

修晓林

9.冷静又充满思考的目光

荒煤老人去世了。是在凌晨的五点十五分。那时候,我做着什么样的梦?现在已是完全想不起来了。只知道在我们十分安宁、惬意的时候,一位饱经风霜又和蔼可亲的老人,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秋天的细雨轻轻地挥洒在编辑部的玻璃窗上,那艰难地蠕动着的水珠,就好似我的那颗悸动着的心。荒煤老人的突然离去,使我更加想念每次与他见面时,那默默地又深情地注视着我的那双眼睛。

荒煤先生,你还记得吗,是1990年一个寒气逼人的深秋季节,我到北京组稿,恰遇部队作家彭荆风在京,于是由他带着我到了你在复外大街的寓所。在你的那间小书房里,我面对着的,是一位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延安鲁艺的老战士,解放后又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且笔耕不辍的正直老人。我不停地说着上海市民弄堂的种种趣事,并不时回答你所感兴趣的问题。我知道,你出生于上海,又于1932年秋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至1937年,是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你的《忧郁的歌》《长江上》两本短篇小说集,所以,你对来自于上海的消息,总是抱有格外的兴趣。而这时的你,则是用一种沉稳又深邃的目光,特别地注视着我这个陌生人。在你的那双略显疲惫的眼睛里,偶尔会闪烁几缕令人难忘的特殊目光。那是因为共同的话题在我们的心中引起了共鸣,也是因为我的心中总在揣摩,在这次难得的见面中,你该对我有什么叮咛和嘱咐?作为一名从事出版事业的后生,特别地想在这特殊的时刻,听到您的特别的话语。然而,直到我与你分手,你也未能多说出哪怕一两句话。临别时,我又看了一眼你书桌上的大照片,那是四季如春的昆明翠湖畔,每年冬末春初的特有美景——从西伯利亚飞来南方过冬的红嘴鸥,犹如片片白云,在蓝天下飞翔,在清澈的湖水上嬉闹,照片上,你的头顶和身旁,都是成片如云



的红嘴鸥,几只雪白的红嘴鸥,还停在了你的肩膀上。我神往,心想:哪一次,我也要在美丽宁静的翠湖边,拍上这样一张生机盎然、如诗如画的生活照。

时隔一年半的金秋时节,为筹备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界》“中国人一日”征文活动新闻发布会,我再次到京。待诸事安排妥当后,即抽空拜访你荒煤老人。还是在那间朴素又稍嫌凌乱的小书房中,我们面对面地坐着,杯中的龙井茶飘逸着隐隐清香。你说,你刚刚随同全国政协教科文委调查组到广州、东莞、深圳、惠州四市,调查经济开发区文化生活情况,亲眼所见,到处是一片蓬勃的建设热潮,你呼吁我们的电影应该多拍摄一些喜剧,让我们的人民笑着向历史告别。你还去了杭州,说朋友们都见老了,难得一见,见一次少一次,你特地去看望了八十八岁高龄的黄源先生,并长谈至深夜。

那些时日,正是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进入终评的时刻,作为此项国家大奖的评委之一,你的肩上,当然负有不算很轻的责任。你看着我,指着堆积在书桌和地板上的几摞长篇小说,用一种不胜重负的口气说道:“这么多的书,怎么看得完哪?”此后,你又谈了些文艺界团结的问题,以及自己在起居饮食方面的生活习惯等。辞别时,我自然再一次地盼望着你对我这位文化出版事业的晚辈说上一些什么。但是,你将我送到门口时,仍然没有多说什么,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到的,仍是那冷静又充满思考的目光。

几天后,你参加了我们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的双星杯“中国人一日”征文新闻发布会。同时到会的,还有冯牧、刘心武、顾骥、雷达、从维熙、张抗抗等诸位名家和各大新闻单位的记者。你发言说:“我尽管已年近八旬,时间对我来说太晚了,但对这个征文仍投赞成票,我也要写写自己目前的生存状态。”会议结束时,我们向每位来宾赠送“双星”旅游鞋。你向我说了自己的鞋码后,我就为你取来了新鞋。因为你腰腿不便,我就将那双雪白松软的鞋子慢慢地套在了你的双脚上。你站起身、在厚厚的地毯上跺了跺脚,却嫌脚上的鞋稍紧了一些:“能不能再换一双?”

23.想了一个办法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住得不远的王造时重又被押回了捕房。他对再次逮捕早有准备,没有理会传来的相关消息,他明白自己有妻儿家室,无法避开劫难,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反正是要回去的,逃脱不了不如来个爽快。

公共租界巡捕房,一班人马进入愚园路亨昌里24号李宅时扑了一个空,没能抓捕到李公朴。这位年轻的美髯公,童趣不灭,胆大仗义,他深知不可能逃脱劫难,但他坚持恪守法庭的判决,要法院通过担保的律师传唤才到庭。他没有胆怯地逃跑,在24日下午2时,法庭重开庭时的前夕,出现在法庭,无声粉碎了李公朴逃亡的谣传。

邹韬奋离开高三分院后,被朋友拥进觉林吃晚饭,回到家安稳地睡了一夜,精神恢复了许多。一早醒来,他第一个念头就给沈钧儒打电话。对方告诉他,沈钧儒已于今晨一时又被捕去了。放下电话,电话铃不断响起,不少朋友在电话里劝邹韬奋离家先躲一躲。邹韬奋一下子拿不准主意,拨通律师的电话,询问律师的意思。他告诉律师:“我由你出面保释,当然要负责,不能随便走开。不过,现在竟然出现随意拘捕的事,我想暂时避一下,地址自然要让你知道。”律师表示赞成,邹韬奋洗脸、更衣,用完早餐,叫了一辆汽车到好友家暂避。

下午,律师来电话通知,法院定于下午4时开庭,3时到律师事务所一同去法庭。章乃器被保释后,次日接受莫利哀路29号女主人宋庆龄的邀请,共进午餐。全救执委之一的宋庆龄热情地款待了章乃器夫妇,几人坐定,佣人李妈端来菜肴,宋庆龄边挟着菜边道出了心中的忧虑:“姐夫蒋介石一向出尔反尔,背信弃义,手上沾满鲜血。邓演达被捕后,自己出面力保,蒋介石答应释放邓演达,但在这时蒋派他的侍卫长请被关押的邓演达散步,背后一枪杀死了他,教训不可忘记。所谓礼义廉耻,无非是他的唱词。对国民党元老们的邓演达尚且如此,何况他章乃器一介书生呢?”

章乃器忧心忡忡,沉默不语,闷头吃着菜。席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正在此时,电话铃响起,李妈走到章乃器身边:“章先生,律师

张志让先生来电话,请你听。”席间的沉默添了几分紧张,宋庆龄不安地望着女友胡子婴,温暖丰润地抚摸着胡子婴略凉意的手掌。

不一会,章乃器回到席间,低声转诉律师来电的内容,“志让让我下午四时去法庭,法院要开庭。”宋庆龄抬起脸:“你不能去,否则性命难保。多少仁义之士倒在他的刀下。”胡子婴不安地说:“如果不去,会连累担保的律师。太对不起张大律师了。”谋略深远的宋庆龄对章乃器说:“你把张律师请来,一起研究一个妥当的办法。”胡子婴站起身:“我去拨电话。”

“好吧,我们暂时丢开这一切烦恼,痛快地满足食欲。乃器先生,你是能喝酒的,再来一杯。”她亲自为章乃器斟满酒。胡子婴带着几分喜色,走进饭厅:“张大律师马上就到。”“好吧,子婴,先解决了这些。”她筷子点了点面前的菜肴。

门外,汽车喇叭响起,三人迎出去。一个消瘦的中年男子挟着大公文包走入客厅,四人坐定。

宋庆龄用一口酥糯的吴地方言冷静地对张志让说:“张先生出面保释,负有法律责任,问题性质不严重;而乃器先生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有生命危险。不知张先生是否是这样看的?”张志让点头同意,“我理解夫人的意思,最好是用一个妥善的办法,让法庭找不到什么把柄。否则,也解决不了问题。”宋庆龄略作沉思:“张先生说得对。我看这个办法不知可否,广慈医院与法租界捕房有协定,病人可以不受拘捕,我设法介绍乃器住进该院。”三人不住点头表示同意:“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暂缓一下,为妥帖之策。”“我去找几个朋友商量一下,看看下一步怎么办。”胡子婴说。

很快,章乃器被送到广慈医院一间临窗的病室,他凝视着病房窗外的大草坪,草坪上有几个孩子在玩耍,他们无忧无虑地追逐戏闹。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头被囚的雄狮,寂寞、孤独,远离朋友和自己的战场。“怕死吗?”他不禁自问。如果这样,当初银行里的朋友、师长劝自己出国留学又为何拒绝了昵?

他在房里徘徊起来,一种无形的窒息压迫着他,使他异常痛苦。

长河秋歌七君子

潘大明

